

是噩梦之乡还是作家乐园

略论邺下文坛的创作环境

徐树仪

在中国文学史上,对诗人和作家们来说,建安时期一直是被认作为一个令人羡慕的时期,文论家们都把建安时期说成是文学史上的一个黄金时代,把建安文学的主要活动舞台邺下文坛说成是作家们的创作乐园。在这个乐园里,作家们被安排在最有利于发展他们才能的环境中,从而实现了创作的最大繁荣。首先提出这种看法来的是晋宋间的诗人谢灵运。他在他的《拟魏太子邺中集八首》及其《序言》中对邺下作家们的生活和处境作了最美好的想象。他在《序言》中说:

“建安末,余(代指曹丕)时在邺宫,朝游夕宴,究欢娱之极。天下良辰美景,赏心乐事,四者难并,今昆弟朋友,二三诸彦,共尽之矣。古来此娱,书籍未见。”在此稍后,梁代的刘勰在《文心雕龙》的《时序》中对邺下文坛进一步作了全面的令人羡慕的描写,他说:“自献帝播迁,文学转蓬。建安之末,区宇方辑。魏武以相王之尊,雅爱诗章,文帝以副君之重,妙善辞赋;陈思以公子之豪,下笔琳琅。并体貌英逸,故俊才云蒸:仲宣(王粲)委质于汉南,孔璋(陈琳)归命于河北,伟长(徐干)从宦于青土,公干(刘桢)徇质于海隅。德珪(应玳)综其斐然之思,元瑜(阮瑀)展其翩翩之乐。文蔚(路粹)、休伯(繁钦)之俦,于叔(邯郸淳)、德祖(杨修)之侣,傲雅觴豆之前,雍容衽席之上,洒笔以成酣歌,

和墨以藉谈笑……”刘勰对建安文学的这番乐园式的描写,遂成为此后一千五百年来文学史家和文论家立论的模式和定论。

当时的实际情况究竟是不是这样?邺下文坛是否真的是这样一个“究欢娱之极”的文士乐园?如果我们不囿于前人的成说,而试着对邺下文坛作家们的处境及其创作情况作进一步的考查,我们也许会得出另外一个结论。

邺下文坛好景不长

为了便于对建安作家们在邺下的活动情况有一个比较全面的概念,我们在此先对邺下文坛作一番时间上的鸟瞰:在三国之初的建安时期,曹魏政权的中心许都和邺城,曾经是当时人材的最大集中地。人材之大量集中于此,是有它的客观原因的。东汉一代,人材的主要产生地区是以京师洛阳为中心的中原地区。这一地区大致相当于今日河南省的全部。而曹魏政权的许都和邺下,也正在这个地区之内。这个地区在东汉之末的黄巾起义和董卓之乱中,遭到最严重的破坏,人材大量逃散。待到曹操迎迁献帝于许都,中原地区稍稍归于稳定和得到恢复之后,四走的人材又都纷纷相率来归,这样就出现了人材极一时之盛的情况。人材们来到许都邺下,各有不同的情况和动机,其中有的是曹操招纳的,有的仅仅是出于乡土之思,有的

是迫于曹操即将统一全国的形势，别无其它的抉择，有的则是因为天子在许，为了尽忠王事而来的，有的是作为曹操敌方的降虏而来的，也有一些是前来观望的。文士们的情况也不例外。曹植在《与杨祖德书》中说的“吾王于是设天网以该之，顿八紘以掩之，今悉集兹国矣”的实际情况，也就是这样。作为建安文学中一些主要代表人物的建安七子，也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聚会到许都和邺下下来的。

在建安七子中，最早来到许都的是孔融。建安元年，孔融为北海相兼青州刺史，为袁谭所攻，弃郡奔许都，献帝征他为将作大臣，迁少府，成为献帝的近侍之臣，没有王命，他是不能离开许都的。建安十三年他在许都被曹操处死，邺下文坛，他是不能算在里面的。

其次是阮籍和应瑒。阮籍在建安之初曾拒绝曹操亲信曹洪的征召，后被曹操辟为司空军谋祭酒。曹操以司空置军谋祭酒是在建安三年，阮籍入幕当在此时。谢灵运《拟魏太子邺中集八首》咏应瑒有“官渡厕一卒，乌林预艰阻”之句，官渡之战是在建安五年，可见建安五年前应瑒已在曹操幕下了。他后来被曹操任为丞相掾属。

再后是陈琳。陈琳本为袁绍书记，建安九年曹操击败袁尚，攻陷邺城，他被俘获。曹操也辟他为司空军谋祭酒。

第五是徐干。徐干入曹操幕下也是首先担任司空军谋祭酒，后来转为五官将文学。他出仕曹氏父子的时间不过五六年（见《中论》序），曹操罢司空任丞相是在建安十三年，曹丕任五官中郎将是在建安十六年，因此可以推算出徐干初任军谋祭酒约当建安十一、二年左右。他担任五官将文学的时间也不过一年左右。大约在建安十七年左右就称病告退，离开了邺下文坛。

建安七子中来得最晚的是刘桢和王粲二人。王粲本在刘表幕下，建安十三年，曹操

南征荆州前他归顺曹操，次年曹操回师时他随来邺下，曹操辟他为右丞相掾。刘桢出仕最初也被任为丞相掾属，这都是建安十三年曹操始任丞相以后的事。

曹操自建安九年攻下邺城，领冀州牧开始经营作为州治的邺城为根据地后，接着又马不停蹄地扫荡河北，先后灭袁谭、定幽州、讨高干、击三郡乌桓、征刘表，直到建安十三年赤壁败后，军事活动才逐渐减缓下来。在这以后，他的幕僚掾属们才能有较多的时间可以在邺城进行文学活动。邺下文园，应该是在建安十四年后才开始繁荣起来的。

王粲在建安十八年转魏国侍中，陈琳后徙门下督，阮瑀迁仓曹掾属。刘桢和应瑒都在建安十六年先任曹植的平原侯庶子，后转曹丕的五官将文学，成为曹氏兄弟的文学侍从。他们除了各自不多的日常公务之外，主要的活动似乎就是陪着年轻的曹氏兄弟饮酒赋诗，今天流传下来建安文学的相当一部份，就是这些诗赋作品。刘勰“洒笔以成酣歌，和墨以籍谈笑”的形容，可能就是这段时期邺下文士生活的想象。

但是好景不长。刘桢在建安十六年任五官将文学的当年即因“平视”曹丕的妻子甄夫人被曹操处罪，减死罚作苦役去了。阮瑀在建安十七年“因病化为异物”（见曹丕《与吴质书》），徐干也在差不多的时候离开邺下，过他清贫的隐居生活去了（见《中论》序）。剩下来的只有王粲、陈琳和应瑒了。到了建安二十二年，在一次大瘟疫中，“王、刘、应、陈一时俱逝”（见曹丕《与吴质书》），明年，建安七子中最后一个徐干也病死了。

从以上时间表上可以看出，从建安十四年到建安二十二年，邺下文园首尾约有八九年时间。建安七子中，孔融一开始就没有参与，刘桢、阮瑀和徐干只有二三年的活动时间，只有王粲、应瑒和陈琳是始终其事的。

但在这八九年中，曹操征孙权，击马超，降张鲁，争汉中，多次征战，邺下文士，每多从行，他们在邺城从容宴饮赋诗的时间也并不是很多的。而文学史上称之为黄金时代的建安时期，它的人材荟萃的全盛日子，不过是建安十四年到十六年之间的二三年时间。邺下文坛的好景是不长的。

春光暗淡的文士乐园

在这个好景不长的乐园里，曹氏父子又给了邺下文士们以怎样的恩遇，为他们提供了一个怎么样的创作环境和一些怎么样的创作条件；他们在这个乐园的天空，为文士们洒下了多少阳光雨露呢？

就曹操本人而论，他确实无愧为一个杰出的文学家。《魏书》说他“登高必赋，及造新，被之管絃，皆成乐章。”可以说明他对文学的爱好和擅长。但他对文学事业的观念，看来是比较淡薄的。他毕竟首先是一个政治家。他对政治的关注远胜过文学。曹操自建安十三年平定北方，以丞相执掌政柄，直到他去世的十多年间，为了发展巩固他的政权，建措很多，但在文学事业上，却未见有任何提倡的措施。他对文学创作也没有发表过任何理论和意见，仅有的记载是刘勰在《文心雕龙》的《诏策》中称“魏武称作教戒，当指事而语，勿得依违。”及同书《章表》中称“曹公称为表……勿得浮华”，这也都是仅就日用文字的文风而言，并不涉及文学创作。

再就人材的培养和使用来说，建安时期的文学人材，除了曹氏兄弟而外都不是曹操培养出来的。曹植《与杨德祖书》说：“昔仲宣独步于汉南，孔璋鹰扬于河朔，伟长擅名于青土，公干振藻于海隅，德琏发迹于北魏，足下高视于上京……”。这是说他们来到邺下之前，都早已蜚声于文苑了。文士们之来到邺下，有的是身为降虏，有的是为了求仕，都不是为了想在文学上逞能而来的。

而曹操收罗使用他们，则是因为他们都有一定的社会名声和活动能量，不能为敌所用，以反对自己。把他们放在身边，利用他们在文笔上的一技之长，让他们为自己的政权做些文字工作，如此而已，并不是对他们有特殊的器重，以至想要创造一个文学创作上的繁荣局面。因为曹操用人，偏重于政治和军事上的才干，或者有较高社会威望可资利用的名儒硕宿，建安诸子除了文学上的才能之外，显然都没有具备上述曹操需要的用人条件。

例如建安十六年他为自己的儿子们选择官属，首先聘用“名高德大”的北海名儒邴原为曹丕的五官将长史，说：“子弱不才，惧其难正，贪欲相屈，以匡励之”；同年又聘请“德行堂堂”的邢颙为曹植的平原侯家丞，说：“侯家吏，宜得法度渊深如邢颙辈”。被聘请辅导他儿子的先后还有老成有德望的人物如崔琰、张范等。而建安文士如徐干、刘桢、应玚等所任的平原侯庶子和五官将文学，地位都在长史和家丞之下，只是一种侍从人员。汉代的文学一般都是指儒学而言的。文学之官的任务是对公子们进行读经习礼，进德劝学的辅导。但建安时期，干戈相寻，世乱方炽，读经早已不是仕进必修的课业，毋须象在东汉早年那样全力以赴了。因此，文学是一种比较闲散的官职，其日常的公事只是陪侍公子们写诗作赋而已。王粲、刘桢、应玚、阮瑀等曾经担任的丞相掾及丞相掾属，官位也是不高的。汉代公府掾的官秩是比三百石到比四百石，掾属比二百石，地位在郎官令史之间。陈琳等担任的军谋祭酒和门下督，也是相当于掾属之职。我们再看曹操南征荆州，刘表手下的知名人士归顺曹操后对他们的安排使用，如韩嵩为大鸿胪，蒯越为光禄勋，官秩都是中二千石，邓羲为侍中，比二千石，刘先为尚书，六百石，就可以知道彼此待遇的差别了。

文士们得不到重用，就在当时也就有人

在议论了。如鱼豢在《典略》中评论王(粲)、繁(钦)、阮(瑀)、陈(琳)诸人时说：“余又窃怪其不甚见用，以问大鸿胪韦仲将。仲将云：仲宣伤于肥馐，休伯都无检格，孔璋实自粗疏，文蔚(路粹)性颇忿鸷……其不高蹈，盖有由矣。”这是指出他们性格行为上有缺点。又吴质在《答魏太子笺》中说：“陈(琳)、徐(干)、应(瑒)、刘(楨)……凡此数子，于雍容侍从，实其人也；若乃边境有虞，群下鼎沸，军书辐至，羽檄交驰，于彼诸贤，非其任也。”这又是说他们缺乏实际政事的才干。在建安诸子中，比较起来，王粲的政治待遇是最好的。建安十八年，魏国初建，他被拜为侍中。但王粲仍然感到自己不受重用。《魏书·杜袭传》载：“魏国初建，(杜袭)为侍中，与王粲、和洽并用。粲强识博闻，故太祖游观出入，多得参乘。至其见敬，不及洽、袭。袭尝独见，至于夜半，粲性躁竞，起坐曰：‘不知公等对杜袭道何等也？’洽笑对曰：‘天下事岂有尽耶？卿昼侍可矣，悒悒于此，欲兼之乎？’”可见曹操对他虽然很亲近，但不过是赏识他的“博闻强识”，可以备顾问咨询而已，对于一些重要的军国要事，他毋宁密商之于和洽和杜袭这些更为有实际政治才干和可信任的人。

但文士们未必都能有那样的“自知之明”。他们中有的本来是风云人物，如陈琳当年曾为总揽国柄的大将军何进作过主簿，在劝止何进征召董卓带兵入京一事上，表现了他谋略上的远见卓识；有的家世不凡，如王粲的曾祖王龚和祖父王畅都是汉世著名三公，父亲是何进长史；应瑒的祖父应奉、伯父应劭也都是有才学声望的名士；有的自视甚高，如阮瑀是名儒蔡邕的门生，在建安之初曾拒绝曹操亲信曹洪的征召，徐干也是不肯轻出的青州高士。文士们来到邺下以后，并不想做悬而不食的匏瓜，他们在功名上不是无求于曹操的。特别是当时许都新建，朝

廷破碎，官职多所空缺，迁补的机会随时都有。因此，当文士们久处下僚散秩，始终得不到重用和施展才能的机会，他们怏怏之情可以想见。这在建安诸子留存下来的诗作中可以找到不少这样的例证。如陈琳的《游览》诗：“骋哉日月逝，年命将西倾。建功不及时，钟鼎何所铭？”刘楨的《赠徐干》诗：“仰视白日光，皛皛高且悬。兼烛八紘内，物类无颇偏。我独抱深感，不得与比焉。”应瑒的《侍五官中郎将建章台诗》：“朝雁鸣云中，音响一何哀！问子游何乡？戢翼正徘徊。”等等，都是充满了仕途失路的牢落之情。而曹植的《赠王粲》诗：“重阴润万物，何懼泽不周？”《赠徐干》诗：“宝怨弃何人？和氏有其珩！”《又赠丁仪一首》：“丁生怨在朝，王子(指王粲)欢自营”等句，对他们怀才不遇的处境也表示了爱莫能助的同情。由于曹操在取士进官方面全凭实际的政事才能和事功表现，并不根据他们的诗赋才能，因此，当文士们一旦沦为公子们的文学侍从，唯以陪随公子们吟诗作赋宴饮游乐为务时，他们一向以功名自许的心胸难免要感到十分酸楚和绝望。如果一定要把邺下文坛比作文士们的乐园，那么在这个乐园里的春光，确实也过于暗淡了。

乐园里的噩梦

建安文士们得不到曹操的信任和重用，困于仕宦，这还是次要的。那些随时可能到来的政治上的灾祸，更成为笼罩在他们头上的巨大阴影。陈琳、王粲他们原先都是曹操的政敌，他们在归降曹操之前，反对曹操都是不遗余力的。其余的文士也都不是一开始就跟随曹操创业起家的人。曹操虽然号称爱贤，对于归顺他的政敌确也表现了宽洪大量，但他对于在他权力之下的官属的控制是非常严厉的。那怕只要有一点点的不顺之心或者异己的态度，都可以导致杀身灭族之祸。当时的著名人士如原九江太守边让，议

郎赵彦，建安七子之一的孔融，尚书令荀彧，魏国尚书崔琰，名医华佗，以及名士许攸、娄圭等人，都是由于这样的原因被曹操处死的。

曹操自从迎迁献帝到许都，平定了中原和北方以后，他的政治野心就不以处于人臣的地位为满足，这在当时也已是“路人皆知”的事了。但由于惮于当时士大夫的舆论和可能引起的内外反对力量，他不得不采取积极准备和相机渐进的办法。在东汉后期，上层社会的舆论主要操纵在清议者之手，所谓清议，本来是指对当世人物的品评和评价，后来发展为对朝廷官吏和朝政的议论，清议本身也渐渐带有一种政党活动的色彩。所谓“匹夫抗愤，处士横议”，“激扬名声，互相题拂，品覈公卿，裁量执政”（《后汉书·党锢传》）就是指的这种现象。在建安之初，清议活动仍然具有很大的社会影响，这种活动对曹操转移政权的政治部署显然不利。因此，曹操在建安十年刚刚平定冀州之后，就颁发了一道申令禁止“阿党比周”、“更相毁誉”的《整齐风俗令》，实际上就是对清议的禁令。同年他又致书警告在政治上不与他合作的孔融，声称他决心“破浮华交会之徒”，这也是针对孔融和他的宾客们的清议活动而言的。在这种情况下，一切涉及时政和当权人物的言论，一切牵涉面较广的社交，都有可能触犯“阿党比周”、“浮华交会”的罪名而受到惩处。甚至两汉以来主要以收集反映民间对官吏和朝政意见的乐府风谣工作也停止了。另外，曹操对属下吏民的伺察和控制，除了朝廷的监察司法官员廷尉、司隶校尉、治书侍御史以及公府的法曹、理曹、刺奸掾史之外，还置有秘密“使察群下”的校事（见《魏书·高柔传》）。在魏文帝黄初之初，有一个校事叫刘慈的，“举吏民罪以万数”，可见当时校事的活跃和可怕了。除此之外，在文士内部也隐藏着象丁仪、路粹这些专以构陷同僚为进身之阶

的人物。因此，在曹操严密控制下的许都和邺下，社会政治空气始终是非常紧张的。在曹操去世之前的建安二十三年和二十四年，许都和邺下先后发生两起大规模的武装政变，被镇压死难的文士和吏民达数千人，王粲的两个儿子也在其中。如果王粲和陈、刘、应、阮辈当时未死，他们是否能不受牵连，这就很难说了。文士们往往雅好慷慨，动多感触，又爱广交同类，这种高压恐怖的政治环境对他们显然不利。这也许就是徐干为什么很早就挂冠回乡，去写他的《中论》去了；应瑒为什么也要象徐干那样“斐然有述作之志”；为什么阮瑀在《谢太祖笺》中要向曹操起“一得披玄云、望白日，唯力自视，敢有二心”的效忠誓言；王粲和刘楨等为什么在诗歌中要“昔我从元后”（王粲《从军诗》）“一由我圣君”（刘楨《赠五官中郎将》）这样赶在人们之前向曹操呼喊“万岁”的原因了。

《典略》记载：“建安十六年，世子为五官中郎将，妙选文学，（太祖）使（刘）楨随侍太子，酒酣，坐欢，乃使夫人甄氏出拜。坐上客多伏，而楨独平视，他日公闻之，乃收楨，减死输作部。”刘楨在建安诸子中是最有才华的诗人，竟仅仅因为“平视”了一下公子夫人而差一点被处了死刑。《魏书·吴质传》引《吴质别传》说：“（文）帝尝召质及曹休欢会，令郭后出见质等，帝曰：“卿仰帝视之”，其至亲如此，”可见只要主人乐意，即使皇后之尊，也无妨加以“帝视”，何以当时的公子夫人就不能“平视”了呢？也许问题不在“平视”不“平视”，而是刘楨在什么问题上的招致了曹操的嫌疑，因此要借故处治他罢了。

使得文士们惴惴不安的还有曹氏兄弟的鬲墙之争和他们的放荡不检行为。曹操在建安十六年以曹丕为五官中郎将、置官属，为丞相副，这本来是确定继承人的一种初步表示。但以后曹操于建安十八年为魏公，建魏

国宗庙社稷，以至到建安二十一年进魏王，却始终迟迟不肯册立太子。这样使得子桓子建兄弟争夺继承权的斗争日趋激烈。他们各树党羽，密谋策划，窥伺时机，制造舆论，以搏取曹操的宠信。曹操为此不厌其烦地先后征询他的亲信如崔琰、毛玠、贾诩、邢颙、桓阶等的意见。本来“立嫡以长，不以贤”这是先秦以来传统的制度，曹丕是当然的继承人，这是无须多加考虑的。但由于曹操认为曹丕不是一个理想的继承人“子弱不才，懼其难正”，而曹植“儿中最可定大事”，要比曹丕强得多，因此，不管这些亲信大臣一再以“立嫡以长”相谏，他对于嗣位之事一直狐疑不定。曹氏兄弟嗣位之争，成为埋藏于曹操政权下面的一颗随时可以爆炸的定时炸弹。邺下文士，周旋于曹氏兄弟之间，无异于置身炸弹之上。如果稍有卷入，即将招致十分严重的后果。王粲虽和曹植在志趣上比较投洽，经常诗文唱和，但他对曹丕也不敢怠懈，小心翼翼地采取等距离的做法，保全了两方面的好感。而公子们放纵无度的游宴之乐，也使得侍从他的文士们感到寒心。在汉代，王子和诸侯犯法，他的家臣随从都要坐罪的。曹植是一向主张以放纵为大节，反对“世俗多所拘”（《赠丁仪》诗）的，刘楨在任曹植的庶子时就深感不安，当曹植对他过份亲昵而反疏远他的上司家丞邢颙时，他写信给曹植劝谏说：“私懼观者将谓君侯习近不肖，礼贤不足，采庶子之春华，忘家丞之秋实，为上招谤，其罪不小，以此反侧。”他和应瑒从原来的平原侯庶子转为五官将文学，可能也是出于对自身安全感的要求。以后建安二十二年，果然发生了曹植和杨修醉后乘车，行驰道中，私开王宫的司马门（正午）而出的事件。开司马门和行驰道，是除了国君本人之外谁也不能享受的特权，这在当时是一种极大的僭逆行为。曹操在大怒之下，主管官门的公车令被处死，作了替罪羊，杨修不久也被曹操借故

杀了。而曹植也终于最后使曹操大失所望，当年即正式册立曹丕为太子。曹操死后，曹丕对以前不利于他嗣立的人逐一进行了睚眦必报的报复，丁仪、丁翼、杨俊等人都以此被杀。这虽是后话，但也是当时可以预感得到的事情。

在公子们举行的各种宴会上，文士们琢句鍊字，写诗以助主人的豪兴。王粲的《公宴诗》有云：“昊天降丰泽，百卉挺葳蕤。凉风激蒸暑，清云却炎辉。高会君子堂，并坐荫华榭。嘉肴充园方，旨酒盈金罍。管絃发徽音，度曲清且悲。合坐同所乐，但慙杯行迟。常闻诗人语，不醉且无归！今日不极欢，含情欲待谁？”是的，在这样欢乐的盛会上，为什么不尽情地极欢痛饮呢？但我们可以想象，在文士们陪随着公子们连宵达旦酩酊痛饮的时候，在他们用最华丽的诗句来组成这欢乐之夜的合唱的时候，他们心中一定清醒地知道：只要他们手中高擎的酒杯稍一失手，就立刻会招来复宗灭族的奇祸的。

文士们周旋于曹氏兄弟之间，作为他们的文学侍从，也并不总象曹氏兄弟在他们的诗文书信中所渲染并为后世许多文论家们深信不疑的那样亲密款洽，尊重礼遇。也许有过几次这种美好的时刻，但这不过是当日主人一时兴来的恩赐，在此后其它情况下就未必是这样了。文士们事实上还得随时接受公子们的轻侮和嘲弄。例如曹丕曾赐给刘楨一根鲜卑族的衣饰“廓落带”，后来因事需要，写信给刘楨借还一用。信上有这样的话：“夫物因人贵，故在贱者之手，不御至尊之侧。……今虽取之，勿嫌其不返也。”这种嘲弄明显地暴露了曹丕心目中他们之间的贵贱界限和对刘楨的轻侮。而刘楨则只好唾面自乾，不以为辱地复信进一步贬抑自己，颂美曹丕，以取其媚。阮瑀死后，曹丕令文士们各作一篇《寡妇赋》以吊问其妻；王粲死后，曹丕又令文士们各作一声驴鸣以送葬，这不免使人怀疑这究竟是对死者和未亡人的

真挚的悼问还是在开无聊的玩笑。他在给吴质的信中，称“古今文人，鲜能以名节自立……”但只有徐干可以例外。这是把徐干以外的建安文士都列入不能以名节自立的“古今文人”中去了。如果他心目中的邺下文士都是这样的人物，那又怎能发自内心的对他们产生尊爱之情呢？而曹植在给杨修的信上，也吹嘘自己看不起陈琳所作的辞赋，因此以“画虎不成反类狗”的话来嘲笑他，又说陈琳竟把他的嘲笑当作赞扬，写文章加以宣传，其卑薄之情，跃然纸上。明代文论家吴淇在他的《六朝选诗定论》中说：“魏氏（曹操）与诸子，不过如富贵人家养几个作诗相公，陪伴自己子弟读书，或游戏，或饮酒，间亦教他代作些书札，其实非怜其才而大用也。”主人与“作诗相公”的关系，实际上已越出了互相尊重的朋友关系或者正常的上下级的关系了；而同时期人锺惺在《古诗归》中评论王粲、刘楨诸子时也指出他们的诗作中有“乞气”，这无非说明在这个春光暗淡、噩梦频仍的文士“乐园”中，已经沦为“作诗相公”的邺下诸子，他们的人格和自尊已经深深的受到了摧残。

不相称的盛名

处于这样的困境中的邺下文士，他们能为建安文学提供一些什么样的作品呢？如果说建安时期是五言诗“腾跃”的时期，那个时期的诗歌比之前的民歌和叙事诗表现了较多的抒情化倾向，邺下文士创作了一些抒发个人性情的五言诗，这也是事实。但是，邺下文士创作的几篇著名的代表作品，如阮瑀的《驾出北门行》、陈琳的《饮马长城窟行》以及王粲的《七哀诗》（“南登灞陵岸”）等等都不是邺下诗坛所盛行的那些抒情作品，其创作年代根据其内容看都远在来到邺下之前。建安诸子在邺下的诗作，主要是刘楨在《文心雕龙·明诗篇》中总结为“怜风月，狎池苑，述恩荣，叙酣宴”的那些辞藻虽然华

丽但思想感情却很贫乏的应酬唱和歌功颂德的作品。除此之外，还有相当数量的由曹氏父子命题，文士们奉命写作的诗赋。其写作方式大类后世的应制诗或现今的作文比赛。这些作品大多是一些缺乏真实感情的空论泛咏，不是无病呻吟，就是因袭模拟。这类作品不过是奉陪公子们作为练笔之用的文字游戏罢了。邺下文士们没有留下什么能够震撼后世人心的作品来。这比起他们的后辈从正始到永嘉间的作家们，不论是嵇康或阮籍，左思或刘琨，都是相形不如的。这种评价甚至也同样适用于邺下文坛的主人——曹氏父子本人。例如曹操那几首慷慨悲凉动人心魄的乐府诗歌《蒿里行》、《苦寒行》、《短歌行》、《步行夏门行》等，都是早于建安或建安前期的作品；曹氏兄弟那些情致深挚辞采婉美最受人喜爱的作品则属建安以后黄初时期的创作。建安时期邺下文坛的创作之花，是开得过于冷落和寂寞了。这和它在文学史上“黄金时代”的称号，是很不相称的。

邺下文坛这种与实际不相称的盛名的由来，首先是由于当时曹氏兄弟与他们的文学侍从们不疲倦地、带有很大“水份”的相互吹捧给后人造成一定程度的错觉有关。杨修、吴质与曹氏兄弟来往的信件是最典型的例证。而谢灵运、刘勰之所以要竭力推崇、过高评价邺下文坛，又与他们特定的历史背景和自身的生活经历有关的。谢灵运作为东晋王谢豪门的世袭贵胄，处境既与依人篱人的邺下文士迥然相异，刘勰则早年即潜心内典，远离世事，对于政治斗争的险恶恐怖也鲜有体验，而刘宋以及齐梁诸帝又一时提倡文学成风，文士们往往受到特殊的宠礼和重用，非复曹氏父子之伎忌刻薄。因此，他们不免以自身的体会来比附想象前人，以致把邺下文坛这个春光暗淡的噩梦之乡臆想成了一个极尽天下良辰美景赏心乐事的文士乐园。后代的文论家们亦复不暇详察，因袭转述，众口一辞。